

木棉花开二十年

●讲述:张宗铝

前不久,去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(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)体检,身边的朋友对我说:“你看,木棉花又要开了。”我抬头望去,尽是含苞待放的木棉花。这时,一缕轻风拂过,让我感慨万千,二十年与病魔抗争的历程,历历在目……

艰难历程

我是2003年6月1日发现自己得了尿毒症的。那时,我是尤溪县电视台的记者和责任编辑。知道自己的病情后,我始终很沉着、很冷静,沉着冷静到跟没有发生疾病一样。

那年春天,非典(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,英文缩写是SARS)的恐怖弥漫全国。作为一名记者,要经常下乡采访,要跟陌生人接触。忙碌了一天,回单位的时候,因为严重贫血,从一楼走到六楼要休息三次。同事风趣地说:“张老师,你得了非典了吧!”

直到5月底,连续几天的感冒不见好转,我去尤溪县总医院(原名尤溪县医院)检查,发现肌酐已经789 μmol/L了。当时的肾内科苏元锦主任对我说:“你要做血透了。”我对苏主任说:“如果不换肾,我就不血透。”在苏主任的建议下,我开始血管造瘘。

我相信中华医学博大精深。心想:在尤溪不好,我可以到北京去看啊!有个朋友知道我得病后,给我一张报纸,他说:“报纸的最后一页有一篇短文,说可以治疗尿毒症。”得到这一消息后,我立刻启程赶往北京,因为女儿在北京读书,找医院比较方便。在北京电话预约报纸上说的那家医院后,当天晚上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。第二天一大早起过去,眼看就要上班了,医院里没有一个人在排队,我知道自己受骗了。于是,我就改道去中日友好医院,到达中日友好医院的时候,大门紧闭。门卫说:“关闭消杀,还没有对外开放。”

在去中日友好医院的途中,路过北京中医药大学,于是又去找北京中医药大学。我想:北京中医药大学有顶级的教授,我在福建看不好,这里的教授不至于看不好。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门诊部的时候,我问肾内科主任彭建中教授:“中药能治好尿毒症吗?”彭教授说:“不可能。会改善一点。”彭教授是三代御医之后的学术继承人,他的话不能不信。

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,肌酐从789 μmol/L降到204 μmol/L,但是到9月初就不行了,不得不进行血透。尤溪县总医院苏元锦主任说:“尿毒症只能血透和换肾,没有其他办法。”

第一次血透特别恐怖,因为血透针头跟兽医使用的针头一样粗。那时,有个病人在叫:“很痛!”护士说:“这么大的针头,哪有不痛的?”

木棉花开

2004年5月11日,护士节的前一天晚上,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。即将移植期间,正

是木棉花开的季节。那时,九〇〇医院外科住院部是一座老旧的楼房,两旁是高大的木棉树。清明节前后,木棉花开,纷纷扬扬的花絮落了一地,甚是好。陶小琴总护士长告诉我:“这是英雄树,也叫木棉花。”我想,在部队医院里种植英雄树多贴切啊!

还记得,2003年12月8日住进九〇〇医院的时候,是杨顺良主任接收了我。那时候,他还不到四十岁。每当得知哪天有肾源,病人就会早早地在泌尿外科门口的水泥凳上等候。看到杨主任急匆匆地下车,又急匆匆地往科室里走,我对病友开玩笑说:“刚才杨主任取回来的肾是给你的。”在场的病友哈哈大笑!有时,我也会急切地走进病房的过道,杨主任就对我摇摇头,意思是没有适合我的肾源。一个月过去,两个月过去,五个月过去……一次次配型,一次次失落。在长达153天的等待中,终于有适合我的肾源了。江南的仲夏夜,气温将近30℃,手术室里有点闷热,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却觉得有点冷。一位姓朱的医生说:“太热了,开空调。”杨主任说:“以病人为重。”那时,我很胖,不能全麻,医生、护士不时跟我对话,不让我睡着。若是刀口疼了,身后的麻醉师就给我补一点麻药。一场手术下来,我在静静地感受接纳新生命带来的快乐,医生护士却在挥汗中忙碌着,这让我更加珍惜新生命的来之不易。

移植手术成功后,陶小琴总护士长把我当作移植病人的典范,号召病人要珍爱生命、乐观向上。她还多次带我去参加在杭州、上海、北京举办的移植运动会。我也不负所望,多次获得摄影比赛一等奖。

助学路上

如果没有肾移植的经历,或许我还不知道生命如此珍贵。

肾移植成功后,我每天早上都去山间小路散步,当时我仿佛觉得路边的小草都有生命。那时,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助学,以助学的方式来回报社会各界对我的关爱。

尤溪县西城镇文峰片区盛产板栗。2006年冬天,我班级的一名女生把帮助妈妈卖板栗的300元钱弄丢了。眼看年关就要到了,家里急需用钱,怎么办呢?那时,她怯生生地走向我,对我说她的生活费不够,向我借100元。我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了她,并对她说不用还。第二年春天,这名女生因家里太穷,没有继续来读书了。出门打工前,她委托最要好的女同学将100元钱和一封信转交给我。自那以后,学生如果生活费不够,我就叫他们直接找我。2014年秋季,我新接了一个班,并担任班主任。一个由爷爷奶奶抱养的男生,因为生



远去的安远老街

●讲述:白森整理·余峰

乡村纪事

记住乡愁·留住乡情

从我记事始,安远老街路面是密密麻麻鹅卵石铺成的,大块长条的石头镶嵌在路中间为一条中轴线,好像是人的脊梁。朴实无华的石头被人们踩出了润泽的光亮。老街两边木屋整齐有序,屋檐下的路面高出街面半尺,这便是街上行人避雨过道。

老街分为上街、下街、杨林街。一大早,熙熙攘攘的人群出现在街头巷尾,到河里挑水的有大人、小孩,妇人们在河边洗衣聊着天;农家男人扛锄挑肥去自留地干活,十岁左右大的孩子也早起放牛了。这时候公家的饮食店早市也开张了,主要是炸油条、卖豆浆,方便群众需要。老街中心的拐弯处就是早市,早晨6时左右开始,这里有一个多小时热闹的光景,老街两边摆着各种新鲜蔬菜,全部是当地勤劳的菜农挑着担子从四面八方村落赶来的,沿着老街延伸下去,还有卖豆腐、河鱼、柴火的。早市结束后,街面恢复整洁干净。到了17时左右又有一个傍晚市。要是到了传统节日时,早市更加热闹。记得有一句顺口溜概括安远老街墟日:上街、下街、杨林街,墟日人满街,还有五条水弄街,河边洗刷挑水走台彰。

那些年,流动人口都是有手艺的人,街上开打铁店、缝纫店、理发店都是本乡本土人,做木匠、打银匠、弹棉花的师傅分别来自江西、浙江、广东。在理发店门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烧腊伯、清才伯、胡家伯,邹婆坐在门口,面前放着两个小箩筐,箩筐盖翻上摆着装满的花生、毛栗子、小梨子等零食。时不时还有“敲锣罗糖”的人挑着担子,一把小铁锤和一块切糖刀片灵巧夹五指中,有节奏地敲打,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,吸引各家小孩把家里的破铜烂铁、破塑料鞋、牙膏壳、鸡鸭毛……拿出来换鸡罗糖(麦芽糖)吃。“打铁店、缝纫店、理发店,店店生意旺。做木匠、打银匠、弹棉花,工匠精湛人人夸。”这句顺口溜是当时老街真实写照。

安远老街历史悠久,淳朴、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,这里的故事几天几夜讲不完。

安远乃文明古镇,历史悠久,古称下土寨,旧名黄土岗。宋为安远寨,清为招得里,后设安远巡检司建制,故有安远司之称,民国时为安远镇。安远是个农业大乡,产粮大乡。境内物产丰富,历以盛产仔猪、稻萍鱼著称。鲤鱼干、辣椒干、红薯、魔芋、豆腐皮、老鼠干等土特产品种类繁多,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美誉。因地处位置特殊,自古以来,安远老街集市一直是周边乡镇的商品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,集市交易一贯红火,边界贸易活跃。

小时候就经常听老人说,整个宁化只有两个墟场有墟胆,其中之一就是安远。对于墟胆是什么,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是种气,有人认为是城市的声音,并说凡到墟天,在狮子岭就可听到安远墟场上轰轰的墟胆声,说明墟市的繁荣程度。

淳朴祥和的安远老街永远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记忆中。

岁月回眸

时光印记·往事钩沉

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的329名学生(占当年厦大学生绝大多数),以及部分教师,在上海成立大夏大学,后更名大夏大学,表示由厦门大学变更而来。

1925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,大夏大学的学生担当主力军,在上海名声大噪。学校同时仿效西学,开设导师制教学,成为中国第一个实施导师制的大学。一时享誉世界,获得“东方哥伦比亚(大学)”的美誉。

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,大夏大学师生被迫流亡到贵阳继续办学。

1945年8月15日,抗日战争胜利结束,大夏大学复迁上海,结束长达八年的贵州之旅。

1951年10月16日,华东师范大学以大夏大学(1924年)和光华大学

(1925年)为基础,同时调进圣约翰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部分系科,在大夏大学原址创办而成。也就是说,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主要是大夏大学。而我的父亲施宗白生前曾是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,有1994年编辑出版的《大夏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》,附录的历届学生名单为证。

父亲由此成为有史以来,江苏省

大夏大学的学生

●讲述:施晓宇

扬州市泰县俞垛镇茅家庄(今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姜家庄)全村第一个大学生,而且是出生于拥有八个子女的普通农民家庭,实属不易。因为有良好的家学渊源,父亲施宗白、母亲严蜀君生育的三个儿子:我、施新宇、施霁宇,在1977年12月全国恢复高考后:1978年7月,作为长子,22岁的我在当了四个年头的知青和半年的工人后,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;19

岁的次子施新宇在当了两年工人后,考入西南交通大学理论力学系;1979年7月,年仅16岁的三子施霁宇从福州第11中学高中毕业,考入南京邮电学院自动化管理系。

随后,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,获文学学士学位;施新宇考取同济大学理论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,获硕士学位;施霁宇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,获博士学位。

值得欣慰的是,父亲母亲的四个孙子、孙女也都好上进:长孙施诺宇为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心理学专业硕士毕业生;孙女施睿为南京工程学院本科毕业生;次孙施成为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二学生;三孙施泽为新加坡在读高中生。